难忘“第一次”

□李 颖

从2004年博士毕业，至今已11年，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正规院校进行系统的脱产培训了。所以，当得知被选调到中央党校中青二班学习一年时，激动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满怀着无限的渴望和期待，我踏进了心中的圣地，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中央党校。

第一次作为学员聆听刘云山校长讲话

2015年3月1日，庄严的大礼堂，中央党校2015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刘云山同志作了题为《领导干部要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的讲话，深入浅出，发人深省。

刘云山同志辩证分析了忠诚、干净、担当三者的关系。他说：“忠诚是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本，担当是成事之要，三者犹如鼎之一足、缺一不可”。首先，我们的干部是党教育培养起来的干部，对党忠诚应当是基本的政治品格。对党忠诚，就是要忠诚党的信仰，忠诚党的宗旨，忠诚人民，忠诚党的组织。其次，为政清廉是党的性质的根本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坚守个人干净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为官底线。“思想上一尘不染，行动上才能一身正气。”而怎样才能管住自己、战胜自己？“关键是筑牢思想防线，做到自警自律、慎独慎微。”最后，领导干部肩负着重要职务，有职就有责，有责就要担当，敢于担当是领导干部应有的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就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就要强化问题意识、勇于直面矛盾；就要抛开私心杂念、树立一心为公的情怀。

关于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的素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但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刘云山同志从自觉忠诚于党、干净做人、勤奋干事三个方面，对领导干部的核心素养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言简意赅，促人警醒。而领导干部如何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刘云山同志特别强调：“要靠内在的自觉和自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和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严峻的，因此，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十分重要和紧迫。

忠诚、干净、担当——这六个字，从此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时刻提醒着我：政治上清醒坚定、作风上清正廉洁、事业上奋发有为。

第一次深入了解党校教学特点

开学典礼后，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徐伟新副校长的“教学引言”。原以为，就是一个简单枯燥的、走形式的说明会或介绍会。可没想到的是，徐伟新娓娓道来，从中央党校的定位，到中央党校的教学，再到学习注意做到“三个贯通”，把一个“教学引言”讲得有声有色、立体生动，同时充满了哲学思辨和理论思考。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突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突出政治理论和党性教育，这既是党校区别于一般国民教育和其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鲜明特点，也是党校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正如徐伟新所言：“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是中央党校教学的最大特色，也是党校教学的优势。”她还介绍了党校“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理念。“一个中心”就是以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理论基础，二是世界眼光，三是战略思维，四是党性修养。“总之，通过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论’与‘道’，而非‘技’与‘巧’。”

习近平同志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几次讲话都谈到冷思考、踱方步。他说，有机会上学，好处确实很多，别老在一线。在一线轰轰烈烈，没有冷思考的时间。好多事情总结一下，感觉都是今是而昨非。冷静下来，总结一下，非常有必要。在我们的事业中，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就每一个人而言，也要有一定的踱方步的时间。

我理解，中央党校的基本理论和党性教育，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学习，使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确立坚强的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中央党校的每一位学员来说，在校学习虽然只是一阵子的，而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第一次系统重读马列原著

运用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的数字需要更大地增长。

这次在党校学习，第一单元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研究”。主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的导读，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列宁晚年著作导读。其实，从中学起，一直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我们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复学习过相关内容。但是，当时大都为了应付考试，是被动学习，是强制性的死记硬背。

这一次，再重读马列经典著作，突然间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受。正如老校长杨献珍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的著作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但要解决好我们当前的所有问题，必须用马克思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其“为人类服务”的情怀，“高度预见性”，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都呼唤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引领着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党校是一座富矿”，每一位老师都是一股智慧之泉，“每个学员都是一本书”，学员中同样蕴藏着无尽宝藏。而中央党校“从政经验交流”与基本理论学习交互进行的安排，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挖掘这些宝藏，读懂每一本书，实现理论与实践相互验证、纵向与横向相互促进的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感谢中央党校科学合理的教学规划和设置。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二班学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

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征文选登

读书的心态

□苟志效

费尔巴哈认为，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其实，就人的精神性存在而言，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从他的阅读范围上，就能判断他的精神品级。靠本能生活、靠原始的感情生活还是追求理性的生活？读书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阵地，读书在党校，其意义和作用更加特殊，值得有心者深思细查。

党校应该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党校学员和教职员工如何看待读书，不是个人私事，而是涉及治国理政的政治问题。因而，警惕、反对错误的读书观，树立正确的读书观，是必须明确的。如读书做官论，有一些人，从功利的目的出发读书，读书为的就是能做官。“学而优则仕”“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说法，便是此类功利论者的画像。如今的各种学历学位批发现象，一些盲目的出国、出境培训，似乎都有此嫌。还有一种读书万能论，主张半部《论语》治天下，尽信书，在书本的教条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终极解决办法。此论既有历史传统，又有“任性”的市场。持论者多为教条主义者和复古倒退派。对我们来说，应该确立读书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过程的观点。正如苏轼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党校人读书，要强调读书过程中书与人的互动，要以人为主。人读书还是书读人？当然是要提倡人读书。正如俗语所言，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别人可以替你烧菜，但却无法替你吃饭。读书有没有用，如何用，并不取决于书，归根到底取决于你自己。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读书要有利于党校功能的发挥和党校教育价值的实现，这是党校的使命所使然。读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借鉴间接经验。人是一个问题机器，应对问题，间接经验可以提供方便有效的应对模式。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怠矣。没有间接经验，我们就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治国理政就无从谈起。读书之道无他，贵在能变化气质。人无贵贱，学无止境。“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知知与无知的辩证法，才能有所畏惧，有所畏惧，才能理智地面对世界、面对自己，才能安身立命。一个成熟领导者的气质的养成，如遵法规，知分寸；合时宜，懂进退；守纪律，有主见；欲人敬，先敬人；智慧、忠诚、勤勉、廉洁等素养，都需要“书底子”。

读书的状况还影响党校的品位，是党校有没有魅力、能不能树立榜样的大问题。党校人如何读书，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如果为读书而读书，学富五车，百无一用，就像李白所说的那样“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如此读书，自然就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把一个人变成了有学历、学位的文盲，变成了有生命但却无智慧的知识存储器。只有用心思去读，用智慧去读，用激情去读，才能读出精彩、读出真理，才能将自己读成想干事、会干事、干好事、不出事的干部。党校还要在反对假读书，读假书上做出表率。毋庸讳言，关于如何读书，当前有一种逆向模仿的现象。读书，其实也是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书籍提供给我们的无非是一个思想环境。环境对个性的塑造来自两点：一方面，对环境“模仿心理”，也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另一方面，人对环境还有很强的逆反心理——近朱者偏偏黑，近墨者偏偏红。当然，所谓的逆反，也可以是“模仿”，只不过模仿的对象刚好是他身处环境的对立面。读书中的逆向模仿是指近朱者黑，近墨者赤。有些人读书不求正解，却求歪念，读书不为悟大道，一心只在潜规则。这是和党校读书的宗旨背道而驰的，需要警惕和反对。

总之，关于读书，选择什么样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我们来说有没有读如在，读书如书在这样一种态度和情怀，其影响，是自不待言的。但愿我们都能有一种求知若饥，求知若愚的读书心态。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党校）

追求实事求是的精神境界

□宋惠昌

每个人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上，在对人世间的观察中，由于阅历的差异，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将越来越符合客观实际。这标志着人的认识逐渐提到了更高层次，是人生更加成熟的思想阶段，其实质内容，就是人们所追求的实事求是这种精神境界。

每个上了年纪的人，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还会记得自己这样的人生体验：一个青年人初次踏入社会的时候，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这个世界是多么真实可爱，整个社会一片光明；过了一段时间，他逐渐发现了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着的一些丑恶现象，或者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各种问题，这个时候，他就认为，社会上尽是肮脏的东西，甚至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于是，他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甚至对什么都不相信了；再过一些岁月，待到他有了更加深厚的人生阅历之后，开始对人生和社会进行重新认识，逐渐感到绝大多数人是善良的，是可信的，整个社会正在不断地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于是，他对这个社会逐渐有了信心，并且看到了整个社会的美好前途。应该说，这是一般人对事实真相的一种追求过程，通过这样的认识之路，人就能够达到一种比较高的精神境界。人们这个精神境界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人们对世界、社会、人生的认识，更加实事求是了。

一般人的这个认识过程，与禅悟的所谓三境界说是一致的。据禅宗一个公案中的记载，宋代青原惟信禅师说过，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如今，亲见知识，有个人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息处，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个广为流传的三境界说，说明禅悟与一般的理性认识、一般的逻辑判断不同，它是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体认过程，企图在个人的亲身体验中，来得到对人生、对世界的真实性的真正认识。看来，这就是禅悟所说的对实事求是精神境界的真挚追求。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禅悟是一种经验主义，因为它把人的经验看得比理性认识更重要，而且有的时候甚至忌讳概念化、逻辑化的认识方式，而要求通过亲身直接的体验，以便使自己能真正认识到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禅悟要求人的认识，不是从概念出发，不是运用某种逻辑描述，不是运用一般化的或者理性化的思想模式，而是要通过人们心中直接认识到的事物本来面目，来得出对事物性质的判断。这就是禅悟这种认识方式所说的，人们应该直接认识我们心中的真理。

在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中，对人的认识要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可以说是认识中的最大难题。这是因为人有思想，人有个性，人性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不应该在想象中，把人生看作一种逻辑的，甚至是数学的过程，因而可以用一种固定的思维法则，来作为对生命过程的认识论公式；这就是说，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不是遵循某种先验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充满了个性特征，所以，住往是在破坏这类所谓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形成的。禅悟的这个认识特点，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仅仅靠统一的自外灌输的方式，来获得真理，往往是不牢靠的，而通过自身经验获得的思想，则是很难摧毁的。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力量之所在。

禅悟也不是按照一般人的常识的要求思考问题，也就是说，禅悟是一种超越常识性的思维方式。因为仅仅依靠常识来认识世界，那将是一种平面的认识，特别是对人生的认识，更不能用一般常识来套。因为在常识中的人生，是僵硬的、没有生命力的客观存在。这是因为，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由的创造物，这就决定了人生是艺术。所以，对于人生这个创造物——生命艺术品的认识，必须不受任何人为规范、原则等的束缚，而应该按照生命的本来面目把它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个基本要求。

但是，禅悟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没有任何神秘主义性质，它强调人要认识的，不是一般概念，不是被逻辑格式化了的东西，而应该是在普通人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本身的事实，在这样的认识中，来求得真理。这就是说，人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认真研究自己的生活实际，从这里来探求关于世界、社会、人生问题的真理，使我们的认识越来越真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实事求是精神境界。

随 笔

延安时期的“四四”儿童节

□张德义

中国共产党关爱儿童和高度重视儿童组织工作，党的革命事业的成功就与儿童组织密切相关。在革命时期，党创立和领导的儿童组织主要有大革命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在延安时期，儿童团在艰苦的环境下担负着特殊的任务。陕甘宁边区举行规模盛大的纪念“四四”儿童节活动，自然引起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四四”儿童节的创立

1925年，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首先倡议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要并主张应该有儿童的节日。这个倡议得到了世界不少国家的赞同，不久英国定7月14日为儿童节，美国定5月1日为儿童节。它的宗旨是鼓舞儿童兴趣，启发儿童爱国爱群，唤起社会人士对儿童事业的注意。中华慈幼协会是国民政府统筹全国儿童幸福的机关，也逐渐认识到“儿童节问题，实在是个关系重大的问题”。1931年，由上海中华慈幼协会首先呼吁，继而孔祥熙以“中华慈幼协会会长的资格提议每年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呈请国府通令全国施行”。不久，国民政府颁布了《儿童节纪念办法大纲》，定每年四月四日为儿童节纪念日。中华慈幼协会提出纪念儿童节的初衷是：“使人人有慈幼思想，人人负慈幼责任，并可使儿童自知所处之地位，庶扩大慈幼范围树强国强种之基。”自此，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循例举行了纪念“四四”儿童节活动。

纪念“四四”儿童节活动的开展

每到“四四”儿童节，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举行一系列以表彰会、运动会、文艺表演为主要内容的庆祝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纪念“四四”儿童节活动却成为了少数家境富裕受得起教育儿童的专利，因此范围是很狭小的。许多工人贫苦市民家庭的儿童们是不知道儿童节的，真正能够享受到“四四”儿童节节日快乐的儿童是极少数的。

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延安时期的“四四”儿童节是所有儿童检阅自己力量的日子。因为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们几乎都参加了儿童团，在“四四”儿童节到来之际，儿童们以村、区为单位，儿童团召开自己的会议，推选和表扬学习、生产、放哨的模范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他们颁发奖旗奖品，并号召全区儿童向他们学习，边区的儿童在思想上生活上完全被解放了。

在纪念“四四”儿童节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纸也大力宣传保护儿童、抢救难童以及重视和培养儿童的重要性等内容。为纪念1940年的“四四”儿童节，早在3月5日，《新中华报》便发表了西青救民先队《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之决议》。该决议揭示了抗战以来中国儿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摧残的悲惨情景，概述了全国儿童工作的形势。4月2日，《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纪念儿童节和儿童工作的新任务》的社论，对儿童工作提出了扩大参加抗战动员的儿童团、扩大抢救难童和加强儿童保育工作等任务，以培育民族革命后代和增强民族解放的决心。4月2日至6日，边区教育厅、边区妇联、边区青救会及延安各小学联合举办的有政治测验比赛、儿童座谈会、儿童文艺晚会、儿童游戏晚会和儿童展览会等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

此外，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格外重视和十分关心儿童的成长。毛泽东连续三年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勉励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1940年4月，毛泽东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天天向上”，并发表在4月12日的《新中华报》上。邓颖超也为纪念“四四”儿童节题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941年4月，毛泽东为延安纪念中国第十届“四四”儿童大会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并发表在4月13日的《新中华报》上。1942年4月4日，毛泽东出席纪念“四四”儿童节大会，并为儿童节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朱德总司令参加了这次纪念大会并在讲话中勉励儿童们“要吃苦耐劳，做农人，做工人”，“同时还要把身体锻炼好，念死书，斯斯文文是丝毫没有用处的”。

纪念“四四”儿童节活动的启示

共产党高度重视培养民族革命的后代。国家的前途如何，实与儿童教育的成败有关。虽然陕甘宁边区物资经济条件极端困难，但由于党中央对儿童保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儿童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成长着。边区政府对儿童保育工作的提倡，使得广大热心于保育儿童工作的开明人士在物资上精神上给予保育院以资助，加之边区从事保育工作者忠实于职务精神，把培养革命的后代当成神圣的职责，使得儿童保育工作在抗战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共产党加强爱护保育培养儿童的工作。反对沦陷区对儿童的摧残，揭穿敌人毒化儿童的阴谋。对于沦陷区儿童的惨遭摧残，呼吁国人予以谴责和反对；对于流亡全国的受灾儿童，必予以适当收容与救济。同时改变一般人对儿童的观念，儿童并非父母的私有品，而是国家、社会、世界所共有的革命力量。今天的儿童，负有未来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我们正促起边区党政军民各界对儿童保育工作的注意，为完成培养这新生的战斗的一代而奋斗。

儿童在抗战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儿童被誉为是“社会光明的未来”和“人类希望的寄托者”。在抗战时期，他们张开了响亮的喉咙，挥动着坚强的小手，参加了各项救亡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前线和敌后根据地，有少先队儿童团的小战士们；在边区和大后方，有从事救亡工作的儿童团体和为抗战动员扫除文盲而呼号的小先生们。有多种儿童团体在各地救亡战线上艰苦活动着，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鼓舞了抗战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

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六一”儿童节则是1949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上确定的。国际民主妇联规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将各国的儿童节日统一。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争取全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能够充分享受生活、健康和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加强全世界儿童的友谊，培养全世界儿童国际主义的思想。我国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儿童节改定在每年的6月1日。1950年3月3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今后儿童节庆祝，应定在每年六月一日举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